

从葭芦寨到晋宁军

——宋金河东堡寨典型个案研究

邓文韬

(宁夏大学 西夏学研究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葭芦寨的进筑是宋神宗年间“占尽山界”,构建横山屏障的重要环节。元丰五年(1082),鄜延路经略司从西夏手中夺取葭芦岩并修建为寨。由于该寨孤悬敌境,粮饷转运困难,而在元祐年间(1089)经朝臣辩论,议定与其他三寨一并归还于西夏,换取俘虏。绍圣四年(1097),该寨为北宋所夺回,并再度进筑。为便于保护葭芦寨及其周边耕地,联通河东路与鄜延路、麟府路的联系,北宋在葭芦寨周边另外修筑了数座堡寨,并在元符二年(1099)升葭芦寨为晋宁军,领县二、堡寨十座。皇统二年(1142),金军攻克晋宁军,并先后将其改为晋宁州、葭州。金末,有着关陕门户地位的葭州战火不断,最终被蒙古攻克。

关键词:葭芦寨;晋宁军;河东路;元祐分疆;宋夏战争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2-0049-09

在地势险要之地设置堡寨,是宋朝钳制西夏进攻和逐步蚕食其领土的一种有效手段。自神宗即位以来,北宋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对夙敌西夏也持积极进攻态度。元丰五年(1082)从西夏手中夺取的葭芦寨,就是这一时期的战果之一。此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中,葭芦寨几度易主,成为宋、夏、金、蒙古争夺的军事要地。目前学界对该堡寨的研究,以吕卓民先生《宋代陕北城寨考》中的研究最为详细,该文介绍了北宋时期葭芦寨和晋宁军的建制沿革,考证了西夏统治下葭芦旧寨与沈括所筑葭芦新寨的具体地望。高建国在讨论元符二年(1099)北宋进筑河东八寨二城的原因时,分析了北宋复筑葭芦寨的战略意图,即通过修筑葭芦寨以保护南北交通,维护河外三州和麟府路的安全^①。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北宋两次筑城葭芦的原因并未作出区别分析,也未见解释为何葭芦寨会在“元祐分疆”中被北宋舍弃;对金代统治下的晋宁军、晋宁州和葭州,亦未加以考察,存在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笔者拟按时间段划分,就北宋与金代统治下的葭芦寨(晋宁军、晋宁州、葭州)作一进步研究。

一、葭芦寨在宋夏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葭芦寨遗址,位于今陕西佳县黄河西岸的山岭上,处于横山山脉余脉东端,葭芦河与黄河交汇处北侧。城址平面呈葫芦形,南北约1 000米,东西181米。城墙夯筑,外甃以砖石。现存城墙总长1 541米,

收稿日期:2016-01-15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夏通志”(15ZDB031)

作者简介:邓文韬(1988-),男,回族,湖北武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夏学研究。

^①以上研究成果,分别见吕卓民:《西北史地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78页。高建国:《元符二年河东路进筑八寨名称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08页。

高3~9.6米,宽3.5~4.8米,夯层厚17~19米^{[1]665}。《元丰九域志》载葭芦寨属河东路临泉县,在石州西北120里^{[2]174}。

自古以来,中原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由于生活习惯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的兵种优势,马战为北方少数民族之长而汉族之短,以步兵为主的汉族必须借助于防御工事来抵抗少数民族骑兵的攻击,李华瑞先生谓“迄宋夏之争,由于西夏越过长城,进临汉唐政治中心的腹区,因而修筑城寨和城堡成为北宋防御西夏进攻的主要形式”^{[3]221}。宋初,葭芦川下游一带并未引起宋朝重视,发生于此并见于记载的战役唯李继迁诈降诱歼曹光实一战。自治平四年(1067)种谔筑城绥州以来,宋朝开始重视对葭芦川下游一带的经营,其原因大概有三。

其一,从宋夏战争大格局来看,葭芦寨一带为横山东端,是种谔等北宋边将所计划的横山防御体系之东路:

昨条具制贼方略,非谓展拓边面而已,盖欲穷困贼势,窥其腹心,须当尽据山界。若占据山界不尽,则边面之患犹在,沙幕尚为彼用;若占尽山界,则幕南更无点集之地,彼若入寇,须自幕北成军而来,非大军不可。如此,尚当先择险要之地,立坚城,宿重兵,以为永计……仍乞将塞门寨以北石堡、背水、油平、罗帏、盐池一带为中路,隶宥州;米脂、浮图、葭芦、义合、吴堡、银州一带为东路,隶绥德;以金汤、长城领、德靖、顺宁寨一带为西路,隶保安军。^{[4]7857}

种谔将横山作为了防御党项大军入寇的屏障,为了充分发挥毛乌素沙漠对于西夏进犯的阻碍作用,必须完整地控制横山一线。作为横山东延、黄河渡口的葭芦山一地恰好是整个防御体系的东路,与中西路诸寨一同完成“占尽山界”的目标。

其二,从局部地形来看,葭芦属于山地,适于依山建寨,“元丰中,收葭芦、米脂等寨,亦据山而成”^{[5]173}。“诏:葭芦寨居山,形势险绝,非出兵便地。纵贼大至,不过城守。兼本寨城围止千余步,步立一人,止千余人,加计倍之,二千人足矣”^{[4]8232},可见,在宋神宗看来,依山而建的葭芦寨只需要少数人马守备,易守难攻。同时,葭芦寨还位于葭芦川与黄河之滨,亦不需担心水源,且与黄河东岸河东路之克胡寨隔水相依,来往救应,交通便利。

其三,葭芦山周边有丰富的资源,筑寨于此可以夺取西夏所倚仗的资源产地,“传闻葭芦山以北一带,茶铁财用之饶,贼界所恃”^{[4]5363}。此外,葭芦寨的屏障作用还能够令北宋控制住该寨与吴堡寨之间的部分耕地。

元丰四年(1081)的宋军五路伐夏虽然失利,但也歼灭了西夏相当一部分军事力量,夺取了西夏贮藏的后勤物资,甚至获得了银、石、夏、宥等州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这为接下来在横山一地筑城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元丰五年(1082),延州知州沈括“遣曲珍将兵于绥德城照应,讨除贼界葭芦寨左右见聚羌落”,在取得初步战果后,神宗下诏谓“葭芦寨可乘势取之固善”^{[4]7818},于是沈括开始筹划攻取西夏控制的葭芦岩。

二、元丰年间北宋对葭芦寨的经营

元丰五年三月,西夏大梁太后派遣格众将兵三万屯金汤境,入窥鄜州。沈括设声东击西之计,“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绛州防御使曲珍将步骑二万,治师于东川,言欲袭葭芦,出鄜延东道。夏人悉众备东方。师行数里,反旆而西,三日至金汤,拔之,斩首千五百级,俘宥州观察使格众数千人而还”^{[4]7820}。不甘心失败的大梁太后又“塞明堂川以拒珍”,“括阴遣别将李仪自河东客台津夜绝河以袭葭芦,河东将訾虎率麟、丰之甲会之。夏回救葭芦,还,得地二百里,控弦四千人,以守河梁”^{[4]7820}。趁旗开得胜之机,宋神宗“诏自葭芦堡至米脂寨创添堡寨,从沈括请也”^{[4]7820},宋军遂在四月甲子(十三日)^{[6]488}正式开始了葭芦寨的修筑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宋军修筑的葭芦寨并非是在西夏故葭芦岩的基础上加固增筑,而是在与河东克胡寨隔河相对的岸边重新修建了一座新城寨^①,以至于前来援助的太原路钤辖薛义混淆了地望,“至葭芦故城,

^①吕卓民先生考得西夏旧葭芦寨遗址位于今佳县城西北约十里的神泉乡大西沟村西佳米公路南侧。详见氏著《西北史地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不见曲珍兵马所在,所附粮料将尽,去回入界。准本路经略司牒,方知于克胡对岸修葺芦寨”^{[4]7855}。

在进筑过程中,宋神宗曾谨慎地诏令沈括:“体恤士众,须令心自奋励,乐于战斗。若未便人情,且须安养鼓励,或作番休出入,毋得频有驱牵,别致生事。其修葺芦寨军马,更加应接照管”^{[4]7844},然而却依然发生了修城丰州兵哗变事件,“丰州屯驻神锐指挥千余人,薛义所部照应修葺芦寨王安等百余人鼓动军众擅还丰州,及恐喝指挥使张臻言不逊,内捕获十六人,张世矩已陵迟处斩,其余人见捕逐”^{[4]7849}。幸而兵变被迅速镇压,未耽误修筑进程。由《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神宗诏书下注文“今检会近曲珍奏,已修葺芦寨了当”^{[4]7854}可知,葺芦寨的进筑最终于当年五月中下旬完工,历时约一月有余。

葺芦岩被北宋占领后,西夏多次试图发兵夺回。元丰五年九月至六年六月,双方数度在葺芦寨附近爆发小规模冲突^{[4]7930,8037,8080}。北宋也多次在葺芦寨附近设伏,狙击西夏攻击米脂等城寨的部队。宋夏双方各有战损,宋军供奉官王英“恃险出战,败歿”^{[7]310}。西夏之所以一直在努力夺回葺芦,除了该寨“深入本国境界,势在必争”之外,其丰富的资源也是主要原因:“葺芦、米脂二城,里外良田不下一、二万顷,国人谓之‘歇头仓’,又名‘真珠山’、‘七宝山’,言其出禾粟多也。”^{[7]300}可见横山地带的丰腴,一直无法让西夏忘怀。

在西夏的猛烈攻势下,北宋意识到仅仅依靠城池恃险而守,是不足以保证新建城寨安全的,故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葺芦寨的防御。

首先,令鄜延路兵马与河东路兵马共镇葺芦寨。由地理位置来看,葺芦寨在黄河西岸,本属于鄜延路的管辖范围,夺取葺芦的人马也是鄜延路经略司沈括麾下。但由于其位置特殊,与对岸河东路的克胡寨隔河相对,于是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张世矩向朝廷上奏:“新修葺芦寨,乞将克胡寨使臣二员并本处兵马,及石、隰司都巡检那移在葺芦寨驻扎防托”^{[4]7854};神宗欣然接受,“诏:葺芦、吴堡寨已敕河东路管认戍守,缘隔大河,虑西贼侵犯,仰鄜延路经略司以兵马照管应援”^{[4]7855}。元丰七年(1084)知太原府吕惠卿又“乞分河东第九将岚、石州马步军八指挥,岁更赴石州葺芦、吴堡寨防拓”^{[4]8356}。虽然在行政区划上,葺芦寨隶属于石州,但实际上却形成了鄜延路与河东路兵马共镇葺芦寨的军事布置。

其次,组建水军。元丰七年十月宋神宗下诏,令“石州葺芦、吴堡两寨各置水军一指挥,以百人为额”^{[4]8368},至此葺芦寨有了一支水军,既可与陆军配合作战,也便利了该寨与河东诸堡寨的联系。

最后,对于葺芦周边蕃部进行笼络。早在沈括、曲珍试图夺取葺芦寨时,神宗即有手诏:“闻官兵往葺芦寨城界,前知甚有逃窜部落,止在寨外三两程存泊。若不大布恩信,广行招徕,深虑大军引还,结集入寨作过。可令曲珍多方展转开导恩意招安,许与依旧住坐,仍首领等第补置官职。”^{[4]7852}可见神宗对葺芦寨招徕缘边蕃部的作用有一定心理预期。夺取葺芦建寨后,“鄜延路经略司言:‘权葺芦寨主折可适等乞给公使钱千缗,置蕃落一指挥,以五百人为额,召募逃军改刺,或诸军投换,并招弓箭手,借与地耕种。’诏:‘公使钱给七百万,招蕃落兵,河东经略司相度,余从之。’”^{[4]7871}。于是,元丰五年六月“葺芦、吴堡寨各招置蕃落二百人”^{[4]7898},以蕃兵拱卫城寨的目的达成了。

然而,北宋苦心经营的这座城寨,却没有带来预想中的经济效益,相反还使得朝廷破费了过多的粮饷。早在熙宁年间,范育就指出在西夏领土内筑城将面临着的一对矛盾:“盖孤城深寄贼巢,兵多则转饷难给,兵少则捍御不足。”^{[4]5364}神宗定计进筑葺芦时调集了鄜延路、河东路数寨人马以图万无一失,大规模驻军造成了粮饷供给困难的局面。元丰六年(1083)五月,河东路转运司言:“昨自军兴以来,费用浩瀚,又新收复葺芦、吴堡寨,增置官属及屯兵马,支费倍多。近被旨令用钞广募入粟,但本司阙钱支用,乞依常平例,接续支降见钱京钞三十五万贯,依例加饶,庶可召商人入便计置粮草。”^{[4]8071}可见葺芦立寨仅一年有余,河东路转运司便已然无力承担其财政压力,缺钱支用。宋神宗也不得不考虑裁撤与葺芦寨隔河相望的其他堡寨,来节省河东路的开支^①。

由于臣下的力谏,裁撤城寨的举措最终并未实行。神宗继而认为财用不足是由于挥霍无度所致,因此转向制裁边将来节流资金,对于蔡焯的上奏,神宗批示曰:

①“诏鄜延路转运司:‘葺芦寨濒河东路克胡寨对岸,既城葺芦,即克胡、天浑、定羌等寨皆可省去,合其兵力,专事葺芦,委蔡焯相度施行’”。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七神宗元丰五年六月,第7864页。

河东不能出力展拓境土，吴堡、葭芦今创为修筑，洎成，但交割守之而已。虽创添两寨，其实已并七寨人马防戍，余皆旧日边面，未知因何如此艰难保据，显是上自主帅，下至将佐，惟欲广占兵马，不卹耗蠹国财，便已自营，余非所知。其王居卿并管勾麟府路军马张世矩不可倚仗，其别选官代之。^{[4]7867}

元丰七年正月，神宗又下诏曰：

葭芦寨居山，形势险绝，非出兵便地。纵贼大至，不过城守。兼本寨城围止千余步，步立一人，止千余人，加计倍之，二千人足矣。今经略司都不恤边费，视朝廷财用轻若泥沙，无故辄屯重兵，情不可赦。其王居卿虽已离任，令提点刑狱司追上案罪以闻。^{[4]8232}

纵然边将有挥霍国家资产的嫌疑，但大力发展兵马也确实是抗击西夏所需，神宗一味地惩罚边将并不能解决葭芦寨的财政困境。

相较于神宗的节流举措，知太原府吕惠卿更倾向于开源，《续资治通鉴长编》转引《吕惠卿家传》记载：

自师出无功之后，敌势益张，人心惶恐，并边退缩不复敢耕，而新疆葭芦、吴堡间号木瓜原者，膏腴特甚，皆昔西人恃以强国者。惠卿遣知石州赵宗本相视之，得地可耕者甚广。乃雇五县耕牛，发将兵护其外而耕之……惠卿乃上疏乞为营田，其略曰：“今葭芦、米脂里外良田不啻一二万顷。西人名之馱头仓，或曰真珠山，或曰七宝山，言其出禾粟多，而国中所资多出于此也。果能为之法，稍耕其地，则两路新寨养兵之费略已备具，而所资之内地者无几矣，况尽辟之乎……而横山膏腴之地皆为我。”^{[4]8264}

然而，实践证明，吕惠卿开发木瓜原耕地的办法同样不能扭转葭芦寨的经济形势：

壬戌，河东路转运司言：“经略司去年三出兵耕种木瓜原等两不耕地，凡用将兵万八千五百四十五，马二千三十六，其费钱七千三百六十五缗，谷八千八十一石，糗糒四万七千斤，草万四千三百束。又番上保甲守御，凡二千六百三十七人，其费钱千三百缗，米三千二百石，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非民之愿。所收麻粟荞麦万八千石，草十万二千，不偿所费。又预借本司钱以为子种，至今未偿，增人马防拓之费，仍在年计之外，虑经略司来年再欲耕种，望早赐约束。”枢密院言：“河东经略司去岁差借民牛耕种葭芦诸寨田，及发防护军马保甲，靡耗极边贵价粮草钱物，仍夺农时，令民失业，比至收成，不偿所费。”^{[4]8406}

由河东路转运司和枢密院的上奏来看，吕惠卿在战略要地大规模征发平民、遣兵护耕的举措最终是得不偿失的。至此，元丰年间宋廷解决葭芦寨财政困难的尝试均宣告失败。

三、元祐分疆与葭芦寨给赐西夏

宋神宗晏驾后，高太后以司马光为相，推行“元祐更化”，尽废熙宁新法，在对西夏的外交态度上逐渐转为保守。作为神宗开边重要的战绩的葭芦寨，因此也陷入了是留是弃的讨论中。朝臣分为两派，分别阐述了各自的观点。主张将葭芦等四寨给赐西夏的弃守派主要有四个论点。

首先，从当前对西夏处于战略防御的总体格局出发，葭芦寨并无地利可言。如环庆路经略使范纯粹谓：“河东路葭芦、吴堡，鄜延路米脂、义合、浮图，环庆路安疆等寨，皆系深在贼疆。于汉界地利形势略无所利。”^{[4]9009}司马光言：“臣窃闻此数寨者，皆孤僻单外，难以应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地非险要，不足以守御，中国得之，徒分屯兵马，坐费刍粮，有久戍远输之累，无拓土辟境之实。”^{[4]8749}

其次，葭芦寨周边道路不便，粮饷转运不利。左司谏王岩叟以亲身考察的经历说道：“臣访闻晋州上二等人户，于葭芦、吴堡两寨纳税。自晋州至汾州三百四十里，稍通牛车。自汾州又三百六十里而至吴堡，三百九十里而至葭芦，并山路险狭，涧道阻深，不通牛车。及渡黄河，尤为艰厄。白米每斗，官估折钱五拾文，而民间实费伍百文方了得。一斗往来凡一千四百余里，百姓不胜其苦……未有两寨已前，百姓不记曾离本州输税，人人得以其所余养生而送死。自有两寨以来，一年税赋乃十年之费，遂为大患，不复乐生。”^{[4]9558}可见，支移葭芦寨严重拖累了河东路其他州县的民生。

再次,葭芦寨周边并无适耕地,就地开垦养兵往往得不偿失。如右司谏苏辙攻讦吕惠卿谓:“及其移领河东,大发人牛耕葭芦、吴堡两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种,投种而归,不敢复视。及至秋成,复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获,即时腐烂。惠卿张皇其数,牒转运司交割,妄言可罢馈运,其实所费不貲,而无丝毫之利。”^{[4]9181}

最后,北宋可用葭芦等四寨交换在五路伐夏中被西夏俘虏的宋军将士。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言:“臣前曾建议,以所得夏国地土,换易陷蕃人口,犹虑狡黠之情,量遣三五十人应命,以受朝廷赐地。臣欲乞别许夏国每还到汉人一名,赐地之外,更特支绢十匹,则夏人贪利,必肯尽数交换。不过捐中国缣帛数万,可以换易人口数千。”^{[4]9311}

较之弃守派的咄咄逼人,坚守派无论是从人数还是立场来看,都处于劣势。“右仆射吕公著亦以为先朝所取,皆中国旧境,而兰州乃西蕃地,非先属夏人。今天子嗣守先帝境土,岂宜轻以予人?况夏戎无厌,与之适足以启其侵侮之心。且中国严守备以待之,彼亦安能遽为吾患”^{[4]9312};与之观点类似的还有曾常年任职于宋夏边境的游师雄,他对哲宗说道,“先帝弃之可也,主上弃之则不可。且示弱夷狄,反益边患”^{[8]214};河东路转运使马默也上奏称葭芦、吴堡二寨“控扼险阻,敌不可攻,弃之不便”^{[9]1099}。然而在弃守派强烈的反对声浪中,坚守派的意见势单力孤。元祐元年(1086)六月,二府最终议定将葭芦等四寨还给西夏。

宋夏和议达成不久后,局势又一度出现了新的波折。元祐元年七月,西夏惠宗秉常死,崇宗乾顺立,国政归于小梁太后及梁乞逋,梁氏在国内打击异己,排挤旧臣。为转移国内矛盾,梁氏对外采取强硬态度,在军事上继续对宋朝步步紧逼,多次进攻熙河路、泾原路;在外交上,小梁太后“使人请以所许葭芦四寨易兰州、塞门”^{[7]323},试图从宋朝手中换取更具战略价值的城寨。

针对西夏的军事与外交攻势,宋哲宗软硬兼施:一方面拒绝以葭芦等四寨交换兰州和塞门寨^①;另一方面,为了表明诚意,宋朝于元祐二年(1087)正月册封乾顺为夏国主,并赐予银、绢。在宋廷立场坚定,西夏又无力强取的背景下,双方终于在元祐四年(1089)六月达成妥协,北宋“仍将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约一日给赐,所有应合立界至去处,并依已降朝旨及自来体例,计会鄜延路经略司关牒逐路帅臣,各委官随宜相度,认定守把,不得更相侵越”^{[4]10370}。

和议达成后,宋朝试图减少因弃地而带来的损失。元祐四年十月,哲宗诏:“安疆寨外汉蕃人户,并依所乞先次迁移,即不得匆遽,却致人户惊扰。其葭芦、米脂、浮屠寨外,如有住坐人户,亦令依此施行。”^{[4]10469}又鄜延路经略司牒文称:“夏国指定十一月十日交付人口,却欲何日受领四处废寨。窃度夏国必是于其日放出人马,逼胁惊扰。所弃四地住坐蕃汉弓箭手散在郊野,皆有窖藏斛食及土棚屋室,彼既以人马相临,利在抄夺,迭喧惊逐,遂致委弃,虽有防护人马,岂能周遍?欲许令自今便将弃地内汉蕃人户先次迁移,候了绝,接续将寨内官物亦行般运,务于交送人口日前毕事。”^{[4]10469-10470}可见,宋哲宗君臣希望的是迁走四寨内的人口、屯粮以及其他物资,只给西夏留下四座空城。

对于四寨具体地界的划定,双方也存在一些争议,时任太原知府滕甫的墓志铭谓:

将赐寨,公请先画界而后弃,不从。西人已得地,则请凡画界以绥德城为法,从之。公曰:“若法绥德,以二十里为界,则吴堡去葭芦百二十里,为失百里矣。”兵家以进退尺寸为强弱,今一举而失百里,不可。”力争之。已而谍者得西人之谋曰:“吾将出劲兵于义、吴二寨之间,劫汉使不得出兵,则二寨亦弃矣。”公遂复申前议。章九上,至数万言。^{[10]957}

由此可见,北宋朝内的有识之士并不接受西夏方面提出的二十里划界法。在双方交付土地之时,夏人果然“以兵渡河,计肆奔突”,只不过“见太原将訾虎屯兵界上,乃止”^{[7]324}。由于滕甫的提前防御,西夏趁划界夺取黄河以东土地的计划未能得逞。

从客观作用来看,“元祐分疆”并未能消除宋夏双方的嫌隙与怀疑,双方仍旧各自心怀鬼胎,边境军事冲突不断发生。“夏人既得四砦,犹未有恭顺意。居无何,复犯泾原”^{[11]778}，“夏人由河东入寇,攻围麟府

^①哲宗赐夏国主诏书谓“除汉蕃地土,指谕已明,难从换易外,所有岁赐,据前降诏命,合候地界了日依旧”(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二十九哲宗元祐四年六月,10375页)。

州……未几复寇环庆,使熙河进筑汝遮城。八年,乾顺遣使谢罪,献兰州,乞赐塞门砦。诏答以夏人自元祐通贡受赐,后来累次犯边,仍候诸路地界了日”^{[11]1107}。可见,西夏在获得四寨之后并没有收手,相反继续进攻宋朝泾原、麟府、环庆各路。北宋给赐四寨,以图安抚西夏的举措最终还是失败了。

四、绍圣年间北宋对葭芦寨的再次进筑

元祐八年(1093),北宋政局发生重大变化,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后继承神宗遗志,罢黜保守派,任用章惇等人。章惇为相后,“欲开边隙,以谓十年之间,含容备至,而夏人犯边如初,遂罢分画之议”^{[11]1108},宋夏再度全面开战。这一阶段内北宋对西夏的战略战术主要为浅攻扰耕。简而言之,这种战术的核心思想是将部队分兵,不规则地轮番出师,干扰西夏农业生产,以此来削弱西夏。为实行此套战术,需要在前线有大量堡寨作为依托。葭芦寨与吴堡寨间的木瓜原是可耕作地,利于屯兵,可作为浅攻扰耕战术的前沿阵地。况且葭芦等寨归还西夏后,“夏人据横山,并河为寨,秦、晋之路皆塞”^{[9]10929}。为了打通河东路与鄜延路的交通,北宋准备再次着手经略葭芦寨。

与元丰五年由鄜延路担当攻略任务不同,绍圣三年(1096)承担进筑葭芦寨任务的是河东经略司。由于史载不详,我们尚不知晓西夏对北宋归还的葭芦寨进行了何种统治,或许因其战略价值不大,西夏并未用心经营,甚至可能将其废弃,以至北宋在重新夺取葭芦寨后,不得不再次对其进行修筑。关于战争及筑城过程,以时任知太原府孙览的墓志记载最为详细:

及公来,议复取葭芦。而其地峻绝,涧谷重阻,兵不得前,夏人闻之以兵数万屯境上。公乃下令须兵满五万乃行,夏人益遣丁壮就屯,而公兵终不出。夏人屯既久,涉冬月,饥寒鞫疾,公益修战备,犹不出兵……居数日,夏人兵十余万,寇至神堂。公厚集其阵以待之,兵方接,斩数百级,获其酋长数人。夏师度不能支,遂遁去。公曰:“可矣。”乃遣王愍、折克行将兵出麟府。张某、王舜臣出岚石,遂城故葭芦。未就,寇数万猝至,公按兵不动,而使张世永将轻骑由麟州道出其后击之。敌前不能进,而后为世永所击。遂大败,卒城葭芦而还。^{[12]221}

由墓志可知,孙览养精蓄锐,引诱饥寒疲惫的西夏主动出击,待击退西夏大军后趁机发兵两路筑城。又堵截围城敌军之后路,最终击溃敌军,顺利筑成新葭芦寨。至于筑城的具体时间,《续资治通鉴长编》绍圣初年数卷亡佚,依《西夏书事》记西夏争葭芦之战,事在绍圣三年“十二月,争葭芦城,不克”^{[7]341},与孙览墓志中“涉冬月”相合,故宋军夺下葭芦,开始筑城当在绍圣三年十二月。次年闰二月与三月,西夏又两次派兵争夺,均未成功。“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一日,河东路进筑葭芦寨毕工”^{[13]9638},孙览以前后近五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新葭芦寨的进筑。

新葭芦寨筑成之后,很快就发挥了效果:“河东路自去秋及今,折克行等统军出塞,数奏肤功。近出师应援修筑葭芦,复将兵照应泾原进筑,直至长沙川,焚荡贼众,不敢并边耕牧。”^{[4]11519}可见,新建葭芦寨和折克行的出师达到了“扰耕”的战略目的,一定程度制约西夏在边境的经济活动。

五、元符年间北宋升葭芦寨为晋宁军

与元丰时对葭芦的经营不同,绍圣时宋朝二次进筑葭芦后,尤其重视修建周边堡寨。据高建国先生考证,河东路先是在元符元年(1098)修筑了神泉寨、三交堡,又于元符二年(1099)前后修筑了“八城二寨”,即大和寨、大和堡、宁河寨、宁河堡、弥川寨、弥川堡、通秦寨、通秦堡、宁边寨和乌龙寨^①,北宋逐渐在黄河西岸构筑了一个以葭芦寨为中心的堡寨群。该堡寨群的构建,主要起到了三个作用,第一,拱卫葭芦新寨,“癸丑,诏河东相度进筑榆木川,盖葭芦之屏蔽也”^{[4]11770},“又诏吕惠卿、孙览于葭芦、榆木川、米脂中路修堡障,以通两路声援”^{[4]11819},使葭芦寨与米脂、榆木川等城寨在遭到西夏攻击时可相互救应。第二,保护耕地,以便于堡寨屯军获取粮草。“辛丑,令河东相度筑荷叶川或其它要便处,以应米脂,及屏蔽葭芦耕地”^{[4]11753},“河东路经略司奏:今相度葭芦寨西北榆木川北岭上寨地,去葭芦寨二十里,周围据险,南有小

^①详细考证,见高建国:《元符二年河东路进筑八寨名称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沟,泉脉涌壮,可以开井,控扼得隔祚岭、荒土平、玛克朗三处贼马来路,及保护得乌龙谷、韦子川一带耕种地土,后倚葭芦寨,实为便利”^{[4]1170}。元丰七年吕惠卿曾将河东兵马在此耕作,虽然耕地广阔,不下万顷,但正因如此,派兵护耕颇显困难。此番在米脂、荷叶川、榆木川或周围要地建寨,分散把守,可节约保护耕作的兵力。况且还能开发乌龙谷、韦子川等夹在新建堡寨和葭芦寨之间的土地,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减少对于河东路转运司的依赖。第三,联通河东路与鄜延路,“使张世永与克行复出龙横川,斩千级,城宁川。王文振、张某城榆木。而榆木无水泉,有蛇出于南隅,人至蛇,所视之泉如潢涌,遂城榆木……乃使世永、克行城端正,平文振城乌龙川。乌龙距延安之泉山二十五里,而榆木与米脂直,于是秦晋始合,而寇不得至麟府矣”^{[2]221}。“秦”指鄜延路,“晋”指河东路,葭芦寨以及周边堡寨群既确保了鄜延路与河东路的通畅,又缩短了葭芦寨到达麟、府、丰三州的日程,“前此葭芦抵达麟府,往返渡河,动辄旬日,今径其外,一有追呼,昼夜可至。又直接鄜延,声援相应,河外边面始得通完”^{[4]1228}。

元符二年八月,继孙览担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的林希上疏宋哲宗,请求将葭芦寨升为军一级的行政建制,以便统辖周边的堡寨群,其奏疏大致提出了三点理由。

首先,北宋为巩固葭芦寨,于短时间内设置了大量堡寨,控制的领土由之前仅仅在葭芦寨周边,而成为如今的“北自银城,南自神泉,幅员数百里间”^{[4]1227},无论是从控制地区,还是驻军和人口规模上来看,都需要另设一级行政机构来进行治理。

其次,从旧的行政区划来看,北宋赐还葭芦寨后,岚、石两州本隔黄河与夏人对峙,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随着宋廷收复葭芦,新筑神泉等堡寨,“自此岚、石遂为次边”^{[4]1227},已然不是军事一线。况且岚、石在黄河东岸,葭芦等堡寨均在黄河西岸,隔黄河以政令来往不便,故应于黄河西岸的军事前线另设一州军,而不再隶于东岸之石州。

最后,从整个陕北宋朝的控制地域来看。葭芦寨之东北为麟、府二州,西南为鄜延路经略安抚司下辖德军与延安府,东隔黄河与河东路之石州相对。经过孙览、吕惠卿、林希等人的经营,葭芦寨与此数州、府、军道路相连,“声援相应”。再加之其“控制贼马路四十余处,其西即沙碛地,而本路包占横山已尽”^{[4]1228},已然成为了战略要冲。

宋哲宗欣然接纳了林希的意见,下诏“以葭芦寨为晋宁军”,设置了晋宁军各级官员的员额,划定了行政区域:“以知军为岚石路,沿边安抚使兼岚、石、隰州都巡检使,石州知州更不兼都巡检,知军以下听经略司奏举,一次置通判、职官、都监、曹官、主簿共六员……除大和寨、堡隶麟府路,余六堡寨并神泉、乌龙、吴堡皆隶于晋宁。”^{[4]1227-1228}不久后,晋宁军“添置雄猛北城、牟城各一指挥使”^{[4]1225}。为拓广财源,林希又奏请于“新边地置营田司,募兵民以耕”,“朝廷遣较边实,岁得粟十余万石”^{[4]1229}。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黄河西岸的堡寨,晋宁军在初设时还领有黄河东岸的临泉县以及一些小堡寨。大观三年,因“晋宁系极边,兼本路安抚只有一县,户口不多,恐未能资一军六寨之费”^{[13]988},因而将黄河东岸的定胡县和若干堡寨也划归入了晋宁军下辖。至此,晋宁军成为了领定胡、临泉二县,神泉砦、三交堡、乌龙岩、通秦砦、宁河砦、弥川砦、通秦堡、宁河堡、弥川堡、靖川堡等十座堡寨的军级行政单位。

六、金朝对晋宁军(晋宁州、葭州)的统治和经营

自元符二年葭芦寨升为晋宁军至宣和元年(1119)宋夏达成协议和,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和横山一线防御体系的巩固,晋宁军周边基本再未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北宋末,晋宁军再次成为宋朝军事一线。金灭辽后,挥师南下攻宋。宣和六年(1124),西夏向金国称藩。宣和七年(1125),金围太原府,西夏为了配合金军攻势,发兵攻打麟、府、丰等州。晋宁军东北接麟、府、丰,而东隔黄河与金兵封锁的隰、石等州对峙^①,数面受敌。

靖康元年(1126),金军围攻开封,陕西制置使范致虚带部队回师救汴京,留知晋宁军兼岚石路沿边安抚使徐徽言守备河西诸寨。此时的麟、府、丰三州,已在西夏控制之下,徐徽言为了晋宁军的安全,先是北

^①“金人围太原,分兵绝粮道,自隰、石以北,命令不通者累月”(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七《徐徽言传》,13191页)。

伐河外三州，“乾顺不能救，守令皆降”^{[7]390}；又渡过黄河“并取岚、石等州，教戈舡卒乘羊皮浑脱乱流以掩敌”，“阴结汾、晋土豪数十万，约复故地则奏官为守长”，“移府州，约折可求夹攻金人”^{[9]13192}。然而，随着河东的沦陷与折可求降金，晋宁军外援尽失。金将完颜娄室围晋宁军，久攻不下，见城中不钻水井取水而过于依赖黄河水源，于是“载茭石湮塞支流，城中水乏绝，储俸浸罄，铠仗空敝，人人惴忧，知殒亡无日”。后因城内叛将“阴约娄宿启外郭纳金兵”^{[9]13192}，终使得晋宁军被金军攻破。

入金之后，晋宁军基本保留了原来宋统治时的建制，“葭州，下，刺史，本晋宁军。贞元元年(1153)隶汾州，大定二十二年(1182)升为晋宁州，二十四年(1184)更今名。在黄河西，兴定二年(1218)五月以河东残破，改隶延安府。户八千八百六十四”^{[14]632}。从其建制沿革推测，晋宁军在金朝初年或许仍然有一定的战略意义；金朝中期，因周边军事形势缓和，故由军改州。

与北宋晋宁军尚领有河东二县不同，金代晋宁州下不再辖县，仅领神泉寨、永祚堡、乌龙寨、康定堡、宁河寨、宁河堡、太和寨、神木寨、通津堡、弥川寨、护川堡、强川堡、清川堡、通秦寨、通秦堡、晋安堡、吴堡寨等“寨八堡九”，“皆在黄河西，临西夏界”^{[14]632}，其中神木、太和等堡寨在北宋时本属于麟州，至金代方改隶于晋宁州。至于河东的定胡(1195年更名为孟门)与临泉二县，则改隶于石州。

在金朝统治之初，西夏仍然是晋宁军最大的威胁。“葭州，金初为夏人所践，皇统三年(1143)复立军治”^{[15]1583}。西夏协同金军伐宋，本就是受金朝所承诺的领土利诱，然而当西夏拿下天德、云内、武州及河东八馆等地后，金朝又武力夺回。虽然金朝承诺击败宋朝后将陕北部分土地给予西夏，但一直未能兑现，难免引起西夏的敌对情绪。

金夏冲突的另一诱发因素是府州折氏后裔与西夏的仇恨。党项民风素来重视复仇，北宋灭亡前夕，西夏在趁火打劫攻取府州时，对常年效忠宋廷，参与对夏作战的折氏家族之墓地进行了“夷折氏坟陇，戮其尸”^{[7]410}的报复，引起了降金折氏后裔、晋宁军守将折彦文的愤怒，“故激怒夏人使为鼠侵，而条上其罪，苟欲开边衅以雪私仇耳”^{[14]2761}。皇统二年(1142)六月，折彦文“遣兵入府州境大掠，据宁边寨，州兵逐之，不退”^{[7]410}。不甘示弱的西夏在同年八月发兵攻打晋宁军，“彦文不出战，拒守二十日，夏兵不能克，取通秦堡而还”^{[7]410}。不久后，金熙宗派往晋宁军调查情况的张奕向朝廷奏报了夏金冲突的原因，并建议“可徙折氏他郡，则夏人自安”^{[14]2761}。于是，金朝将折彦文派往青州镇守，夏、金边界的紧张局势逐渐缓和下来。

西夏再次与金朝在葭州发生军事冲突约在六十余年以后。12世纪末蒙古崛起，数度南侵西夏与金国。西夏应天四年(1209)，蒙古军包围中兴府，夏襄宗李安全向金朝求援，然而金章宗不但拒绝援助西夏，还幸灾乐祸地言及：“敌人相攻，中国之福，吾何患焉？”^{[16]158}最终李安全向成吉思汗纳女请和，并迁怒于金朝，“安全怒金不发援兵，遣万骑攻葭州，以报之”^{[7]469}，崇庆元年(1212)三月、兴定二年(1218)五月、兴定三年(1219)闰三月，西夏又先后三度进犯葭州^①，皆未能攻克。

1221年，蒙古太师木华黎假道西夏伐金，由东胜渡口过黄河，十月经由太和寨到达葭州城下。金葭州提控王公佐弃城逃跑^{[17]2934}，于是木华黎进驻葭州。木华黎部将石天应建言：“西戎虽降，实未可信。此州当金、夏之冲，居人健勇，仓库丰实，加以长河为限，脱为敌军所梗，缓急非便，宜命将守之，多造舟楫，以备不虞，此万世计也。”木华黎接受了他的建议“以劲兵五千留守葭芦。遂造舟楫，建浮桥”^{[17]3526}。来年，金朝葭州王公佐果然不甘心兵败，“公佐寓州治北石山子，招集余众得二千余人，欲复州城”^{[14]2466}，“葭守王公佐收合余烬，攻函谷关，将图复故地，及见桥成，遂溃去。于是分兵四出，悉定葭、绥之地”^{[17]3527}。

在蒙金战争中，葭州对双方的战略意义是不完全相同的。金朝较为重视葭州的战略地位，京兆行省参知政事完颜合达通过间谍得知“北方已约夏人，将由河中、葭州以入陕西”，于是连忙调遣平凉内族白撒率军东下“以屏潼、陕”^{[14]2466}。将木华黎堵在葭州，似乎已经成为阻止蒙古军进入关陕地区为数不多的办法之一了，但完颜合达和王公佐试图收复葭州的种种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相较之下，蒙古在葭州的防守得到巩固之后，开始有意识地将战略重心转移到河中府。石天应建议木华黎道：“葭州正通鄜、延，今鄜已平，延不孤立，若发国书，令夏人取之，犹掌中物耳。且国家之急，本在河

①分别见于《金史》卷十三《卫绍王本纪》，295页；《金史》卷一百三十四《西夏传》，2874页；《金史》卷十五《宣宗本纪中》，344页。

南,此州路险地僻,转饷甚难。河中虽迫于二镇,实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晋,西连同、华,地五千余里,户数十万,若起漕运以通馈饷,则关内可克期而定。”^{[17][3527]}石天应的献策,说明在河东已经拿下,西夏称臣降服,金军退守关中的大背景下,转运粮饷困难的葭州对蒙古军来说战略地位有所下降,已经不再是控扼秦晋的唯一要冲了。

此后,金蒙双方又在潼关、凤翔长时间进行拉锯战,直到1230年窝阔台与托雷攻破凤翔,尽占潼关以西土地,至此,包括葭州在内的整个陕西正式纳入了蒙元的统治。

参考文献:

- [1]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
- [2]王 存.元丰九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李华瑞.宋夏关系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4]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5]魏 泰.东轩笔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6]李 埴.皇宋十朝纲要[M]//续修四库全书第3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7]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M].龚世俊,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 [8]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9]脱 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0]苏 軾.苏轼全集(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1]王 称.东都事略[M].济南:齐鲁书社,2000.
- [12]毕仲游.西台集[M].洛阳: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 [13]徐 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14]脱 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5]嵇 璜.续通典[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M].济南:齐鲁书社,2000.
- [17]宋 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A Research on the Jialu Fortress and Jinning Jun During Song and Jin Dynasty

Deng Wentao

(Academy of Tangut Study,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China)

Abstract: The Jialu fortress is a key part of the barrier system in Hengshan Mountain. It was built by Fuyan-lu tactical military commissioners in 1082. Since that fortress was built in the Xixia's territory, the Song Dynasty had to station large forces, and it caused a shortage of forage. In 1089, after a heated debate, Song Dynasty decided to return this fortress to Xixia. However, in 1097, the Jialu fortress was once again recaptur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order to shield Jialu fortress and some farmland around it, and linked the other cities with its surroundings, Song Dynasty built a series of fortress. In 1099, Jialu fortress upgraded to Jinning Jun, dominated 8 fortresses and 2 counties. In 1142, Jinning Jun was seized by Jin Dynasty, and Jin Dynasty has changed it to Jinning Zhou and Jia Zhou. In the late Jin Dynasty, Jia Zhou was in war all the year round, and was conquered by Mongolian Empire at last.

Key words: Jialu fortress; Jinning crops; Hedong military district; split territory in Yuanyou; The war between Song and Xixia

(责任编辑 张春生)